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

LANZHOU DAXUE MINZUXUE JINGXUANWENK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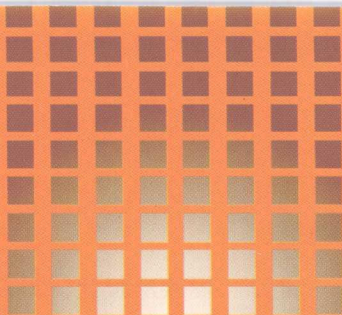
匈奴史研究

XIONGNUSHI YANJIU

武沐 著



民族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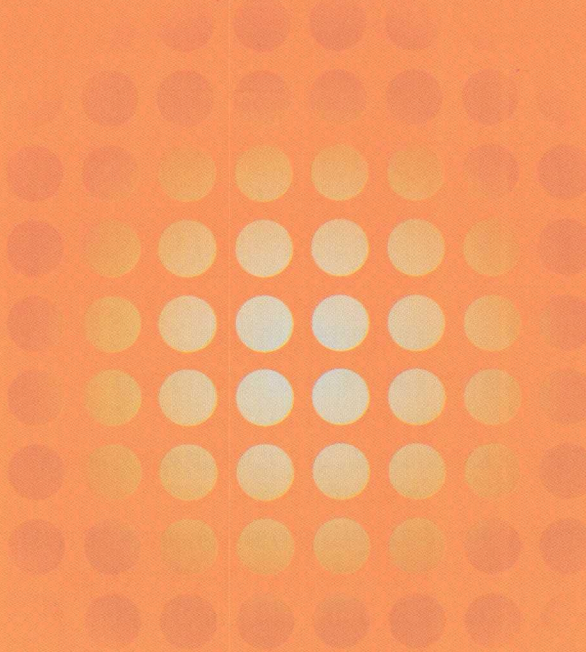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

LANZHOU DAXUE MINZUXUE JINGXUANWENKU

匈奴史研究

武沐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匈奴史研究 / 武沐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5

(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

ISBN 978 - 7 - 105 - 10079 - 8

I. 匈… II. 武… III. 匈奴—民族历史—研究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782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s.com>

北京金若龙公司微机照排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总编室电话: 010 -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11734)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0.25 字数: 170 千字

印数: 0001—1000 册

ISBN 978 - 7 - 105 - 10079 - 8/K · 1664

(汉 831) 定价: 24.80 元

编委会主任：杨建新

编委：马曼丽 王希隆 王洲塔
徐黎丽 赵利生 李 静
杨文炯 武 沐 切 排

序

杨建新

兰州大学走过了一百年的峥嵘岁月。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成立也快十年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出版这套文库，献给哺育我们成长、关心我们工作的兰州大学和兰州大学的全体师生。

民族学在兰州大学只有十多年的历史，与许多兄弟学科相比，他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因此他曾被忽略过、轻视过，不过这个有极强活力的生命，终于还是在兰州大学这块沃土上坚强的成长起来，为自己争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至今，兰州大学的民族学已经是博士学科一级授权点，拥有五个二级博士点，同时是国家重点学科。作为民族学科的载体，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也成长壮大，成为在国内小有名气的科学研究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的研究型实体。

不到十年的岁月里，在中心的老师们辛勤耕耘下，仅由中心老师及他（她）们指导下写出的民族学专著就达八十多部。现在摆在您面前精选出的这套文库，就是这些年来，中心师生用知识、智慧和汗水辛勤浇灌出的部分成果。当然，“精选”者，仅指从上述八十多部专著中精心选出者之谓，并非一定是精品。但是我们有信心，经过我们的扎实工作和潜心研究，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精品问世。

借本文库出版之际，还想就当前我国民族学的发展，说一些心得和体会。

民族学（Ethnology）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学术界时，初译为“人类学”、“民种学”。至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先生始将其译为“民族学”。这一译称虽不完全符合希腊文的原意，也没有紧扣该学科在西方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民族学”这一译称，却十分符合中国的实际。

中国古代虽无“民族”一词，但中国古代用于表达民族共同体的“族”一词的含义，已具有了“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和轮廓。中国古代的“族”，种类繁多，形态多样，发育充分，作为人们的共同体，拥有鲜明的诸多共同因素。而且“民族学”作为一种学科传入中国之时，正是中国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时期，民族问题已成为涉及国家社会稳定、领土完整的大事。民族问题，从清末以来就与社会稳定、边疆安全、抗击外国入侵问题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因此这一译名一出现，立即成为中国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名称。

至今，我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仍有密切关系，而且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学就是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但是，实际上由于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与一些发达国家的“民族”、民族问题和“族群”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中国民族学在研究中已经凝炼出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主导思想，也就是说，中国学术界，在运用从西方传来的“民族学”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密切与中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逐步创建和成长出了中国化的民族学。民族学在中国流行百年的历史，就是民族学中国化的过程。

民族学这门学问在中国，其基本学术概念就是“民族”，他就是研究民族这种共同体及其发展的一个学科，不研究民族，他在众多的学科中就没有地位，也就失去了他存在的价值。他的基本任务，是研究和揭示民族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他是一门科学；民族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民族这种特殊人们共同体构成的诸要素，揭示这些要素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发展、变化、作用、相互联系及其运行机制；民族学当然还要研究和揭示每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质及其具体发展规律。中国的民族并非仅仅是文化群体，而是一个与政治密切相联，关系到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心理及种族、生物等诸多因素的群体，研究他必然涉及众多的学科，因此民族学又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

民族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中国民族学即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中国民族学与国外民族学，有密切的联系，中国民族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研究传统、研究视角等方面，继承和吸收了大量国外民族学的优良成果，同时，中国民族学又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主要表现在下列五方面：

1. 在指导思想方面，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放眼中国和世界民族、民族问题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充分反映和吸收世界民族学发展的优秀思想和最新成果，促进中国和世界各民族平等、和谐发展。

2. 在内容方面，以中国民族学和民族问题为基本内容，构建符合中国和世界民族新发展的知识体系。

3. 在方法方面，采用实证的、思辨的、比较的、综合的多种方法，定性定量结合，描述与分析综合结合，田野与文献结合，充分使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民族学研究有更加广阔的道路。

4. 在视角方面，认为民族是一个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心理及种族、生物等各种因素的群体，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群体，全方位研究揭示民族的各个方面，是民族学的显著特色。

5. 在思想传统方面，继承中国古代对民族实体、民族关系、民族问题丰富而深邃的思想认识，吸取中国历史上处理和对待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经验、政策和方法，使民族学在具有数千年多民族共处历史以及积累了深厚传统民族思想的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发展。

具有这样一些特色的中国民族学，既是当前广大中国民族学者的研究实践，也是多年来中国民族学界的主流愿望。

本文库的出版，就反映了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想在推动民族学中国化，创立有中国特色民族学方面做些工作的强烈愿望。

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2009年4月

目 录

族源族属篇

- 一、匈奴族源研究概述 (1)
- 二、有关匈奴族属研究的概述 (6)
- 三、匈奴族源之我见 (10)
- 四、传统观与方法的辨析 (25)
- 五、浑邪考 (31)
- 六、休屠考 (38)
- 七、休屠、浑邪与五属国 (54)

制 度 篇

- 一、匈奴单于位的继承制度 (66)
- 二、匈奴的婚姻制度 (84)
- 三、匈奴的法律体系 (104)

杂 谈 篇

- 一、白登之围于西汉初年之汉匈关系 (117)
- 二、匈奴姓氏杂谈 (124)
- 三、“吐延”“奢延”为匈奴语南北考 (134)
- 四、勇士县考 (139)

参考文献 (146)

后 记 (154)

一、匈奴族源研究概述

匈奴族源的问题，曾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一度成为 19 至 20 世纪中叶史学界讨论的热点和关注的焦点之一，其观点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位学者所代表的观点：

（一）传统观

所谓匈奴族源的传统观是指匈奴由先秦的鬼方、畎夷、昆夷、荤粥、獫狁、山戎，北狄中的赤狄、白狄等演变而来。这一观点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云：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

司马迁的这一观点经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学者的不断充实和发展，使之更加具体和完善，成为“尧时曰荤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①，或“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荤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迁徙，中国谓之匈奴”^②。在此后的中国史籍中，司马迁这一经过发展和充实的观点一直被奉为主臬，直到 19 世纪末王国维先生才

① 《史记》一百十《匈奴列传》《集解》引晋灼语，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史记》一百十《匈奴列传》注引乐产：《括地谱》，中华书局标点本。

将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但总体上依然是沿着这一方向走下来。

王国维先生在《鬼方昆夷獫狁考》等一系列文章中^①，对于司马迁“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的观点给予了否定，但却充分肯定了匈奴来自獫狁、山戎的观点。不仅如此，王国维先生还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的开创性研究，运用音韵、考据等传统史学方法，进一步将商代的鬼方，西周初期的昆夷等也纳入了匈奴的族源。他认为：

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荤粥。在宗周之季则曰獫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

王国维先生的研究成果一经问世，立即得到多方面的认同，并对近百年来的匈奴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世国内研究匈奴的著名学者，如方壮猷、冯家昇、马长寿、黄烈、林幹等先生，以及至今国内出版的大多数历史著作中多采用此说。

（二）义渠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蒙文通、黄文弼等先生。蒙先生在《犬戎东侵考》、《古代民族迁徙考》及《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等论著中提出，先秦的鬼方、畎夷、荤粥、獫狁等并非匈奴的族源，匈奴应与义渠为族属上的同类^②。其主要论据是《史记》卷五《秦本纪》中记载：“秦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齐率匈奴共攻秦”，而《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以及《战国策》卷三《秦策》载，义渠君也于同年“起兵袭秦，大败秦人于李伯下”。据此，蒙先生认为：

《本纪》言匈奴，即《秦策》言义渠事，参互稽之，匈奴即义渠也。

此外，蒙先生又引吴承志《地理今释》云：

^① 王国维：《鬼方昆夷獫狁考》，载《观堂集林》，卷十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② 《禹贡》，卷六，1936（12）；卷七，1937（6）；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此“匈奴”当从一本作“獫狁”。此乃《左氏春秋》所谓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非《史记·匈奴列传》居于北蛮之匈奴也。^①

黄文弼先生在《古代匈奴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根据宋衷《世本注》“鬼方于汉则先零羌也”的记载认为：

鬼方、荤粥、混夷、獫狁皆古之羌族，与匈奴异。自太史公混为一族，遂令后世羌、胡不分也。

不仅如此，黄文弼先生还进一步认为，匈奴族源不仅有义渠，还应包括林胡、楼烦，他们是战国时匈奴在内地者^②。

（三）夏族说

所谓夏族说，实即司马迁“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之说的再版。持这一观点的主要学者和代表著作有：何震亚先生及其《匈奴与匈牙利》；吕思勉先生及其《匈奴文化索隐》^③。何震亚先生认为，匈奴即夏族，亦即于公元前6世纪建立过中山国的鲜虞人。中山灭于赵后，其族退处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及宁夏一带，至冒顿单于时，势力大振。吕思勉先生则云：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此非无稽之谈也。

他认为，《史记》所云：“自淳维一致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正如周先祖自弃之后亦有“其名与世次皆不可考”之时，然证史者并不因此谓五帝及周之世系皆不足信也。“匈奴与夏后氏之后之可信，理正如此”。

①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② 黄文弼：《古代匈奴民族之研究》，载《边政公论》，第2卷，1943（3、4、5）。

③ 何震亚：《匈奴与匈牙利》，载《中外文化》，第1卷，1937（1）；吕思勉：《匈奴文化索隐》，载《国学论衡》，1935（5）。

（四）西方族源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匈奴并非东方土著，乃西来民族。其主要代表和著作是岑仲勉先生及其《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①；孙次舟先生及其《匈奴出现中国边塞的时代》^②。岑仲勉先生认为：

所考匈奴有西来之痕迹，并非指阿利安种，只似为从西北徙来之突厥种，其人先与伊兰近居，自不难挟伊兰胡以具至（例如突厥既定西方后，其国有九姓胡不少），则《晋书·载记》所说，亦非无因……此余所以认匈奴属于突厥族也。

孙次舟先生认为，匈奴本为西方草原一支游牧民族，但从西方何处来，孙先生并未说明，只是说匈奴在秦始皇以前尚未游荡至中国北部。《史记》卷八十一《李牧传》所谓大破匈奴者实为汉人的误解，并无其事。李牧所破乃东胡，非匈奴也。

（五）北方草原民族说

匈奴最早出现于北方草原的观点得力于有关匈奴考古的一系列发现。在这方面俄罗斯学者起步较早。1896—1902年，俄罗斯学者塔里克·格林采维奇在吉达河、色楞格河、奇科依河和希尔卡河流域发现有近百座匈奴墓葬，并对其中两处较大的墓葬进行了发掘，从此揭开了匈奴考古发现的序幕。此后，俄罗斯学者、蒙古学者又相继在外贝加尔的乌兰乌德地区和今蒙古国境内发掘了大量的匈奴墓葬。据此，俄罗斯及蒙古国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匈奴族与蒙古境内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所谓石板墓文化的代表者有关的观点^③。不过在当时国外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并未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同，因而也没有被及时地介绍到国内。

国内学者有关匈奴起源于北方草原的观点出现得较晚，但至迟在20世纪60年代已有论述。1963年4月10日曹永年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战国历史上的“匈奴”》一文。文中提出，战国时期匈奴的活动曾三次见于记载：第一次是在秦惠王后元七年（公元前318年）

① 岑仲勉：《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载《真理杂志》，第1卷，1944（3）。

② 孙次舟：《匈奴出现中国边塞的时代》，载《西北通讯》，1947（3）。

③ 参见林幹：《匈奴墓葬简介》，载《匈奴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韩、赵、魏、燕、齐率匈奴共攻秦”，但曹先生认为这一次的“匈奴”实际为义渠，这一观点与蒙文通先生略有相同。第二次、第三次的“匈奴”实际上指东胡、林胡、楼烦，并不是真正的匈奴。缘何如此，曹永年先生分析说：

先秦时代的匈奴只是当时北方许许多多不同族源、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部落和种族中的一个。后来匈奴逐渐强大，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过去独立的楼烦、白羊、丁零等族以及一部分的东胡、义渠等，现在都成了匈奴的组成部分，“皆以为匈奴”。

曹先生的论述可以说是当时国内最为鲜明地提出匈奴形成于北方草原的论点，但是，由于当时国内有关匈奴方面的考古未能就此提供明确的支持，仅靠文献记载来论证这一观点是很难找到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史料和依据的，因此，曹先生的观点在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如秦惠王后元七年“韩、赵、魏、燕、齐率匈奴共攻秦”是否有其事虽有待商榷，但从逻辑上推理，匈奴伐秦与义渠君起兵袭秦完全可以同时存在，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再如，说李牧面对的“匈奴”实际上是东胡，其实也是言之人殊，因为，说此时的匈奴出现在赵国的北边是完全有可能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国内有关匈奴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考古成果的大量问世，匈奴形成于北方草原的观点又被重新提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论著有：杨建新先生及其《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①，吴荣曾先生及其《战国胡貉各族考》^②，宋新潮先生及其《匈奴早期活动地域考》^③，田广金先生及其《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④，郭素新先生及其《试论汉代匈奴文化的特征》^⑤，乌恩先生及其《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⑥。杨建新先生认为：

①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② 吴荣曾：《先秦两汉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

③ 宋新潮：《匈奴早期活动地域考》，载《民族研究》，1993（6）。

④ 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载《考古学报》，1983（1）。

⑤ 郭素新：《试论汉代匈奴文化的特征》，载《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1981。

⑥ 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考古学报》，1990（4）。

匈奴族是以早已存在于北方的某一强大部落为主，吸收融合了从夏、商以来活动于北方的鬼方、荤粥、獫狁、狄、戎等各种部落，甚至还包括由中原北上的一部分华夏族，经过长期的融合过程，在战国后期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从他的族源方面，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北方的许多部落，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是战国后期才形成的一个民族。

乌恩先生结合国内外考古发掘成果认为，匈奴的族源不可能是单一的，他一方面与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晚期石板文化居民有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又有相当部分来自中国北方的古代部落，其中较大的有林胡、楼烦等；匈奴族源的这种地域性差异不仅表现在不同地域间匈奴的文化特征上，这种文化特征甚至是导致日后匈奴分为南北两部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还在体质人类学方面也可得到足够的印证。

由于上述学者的不懈努力，有关匈奴起源于北方草原的观点，近年来已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有关匈奴族属研究的概述

在匈奴族属问题上，大体有蒙古人种说、突厥人种说、芬人或斯拉夫人种说等几种说法。国内大多数学者及蒙古学者多主张匈奴为蒙古人种，如方壮猷、马长寿、黄文弼等先生，蒙古国学者策·道尔吉苏荣先生，英国学者霍渥尔特先生也赞同匈奴为蒙古人种。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先生早年曾主张匈奴为突厥人种，后通过对匈奴语言的研究确认，匈奴人的基干为蒙古人种^①。王国维先生认为，匈奴“深目多须”，与西方胡人相同，属突厥人一类^②。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冯家昇先生、岑仲勉先生等^③。苏联学者伊诺斯特兰采夫在其《突厥匈奴与匈奴》一书中以及阿·恩·伯恩施坦在其《匈奴史概要》一书中也称匈奴的族属应为突厥人种^④。在持匈奴为芬人或斯拉夫人种说的学者中，国内学者主要有

① [日] 白鸟库吉：《匈奴民族考》，引林幹：《匈奴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西胡续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③ 冯家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载《禹贡》，1937（5）。

④ 阿·恩·伯恩施坦：《匈奴史概要》，载《民族史译文集》，1959（2）。

郑师许、孙次舟等先生^①，国外学者则大多集中在19世纪早期，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得几内（J. Deguignes 1721—1800）及其著作《匈奴、土耳其、蒙古与西方鞑靼的通史》；德国学者夏特（Friedrich Hirth 1845—1926）及其著作《窝耳迦河的匈人与匈奴》；荷兰学者底哥柔提（J. J. M. DeGroot 1854—1921）及其著作《纪元前的匈人》^②；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及其著作《匈奴·芬同族论》^③。这几位学者均认为匈奴即5世纪欧洲的匈人。

在考古学尚未普及的时代，各国学者对人种划分的主要依据：一是语言，二是体质、相貌。

就语言而言，由于匈奴语言留传下来的不多，而且多为两汉时人按当时的读音以汉字译写下来的，其中能够依据文献而探明语义的词汇仅有十多个，因此，对于匈奴语言的研究也是众说纷纭。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匈奴语属阿尔泰语系，只是究竟属阿尔泰语系中的哪一语族则分歧较大。有言突厥语族者，有言通古斯语族者，也有言蒙古语族者。主张匈奴语属蒙古语族的看法曾在19世纪大为流行，后来则持匈奴语为突厥语族的观点占了上风。今人亦邻真曾发表题为《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一文，文章认为“并不排除阿尔泰语系中原曾存在第四种语族的可能”，只是这一语族后来消亡了^④。方壮猷先生在其《匈奴语言考》中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通过对匈奴的国号、王号、官号、人名、地名、物名等数十个匈奴名号的考释，考释出匈奴语言与今土耳其语相近似者凡十一语，与今通古斯语相类似者十二语，与今蒙古语相类似者凡二十语，三种语言之共同语言者约占百分之十。方壮猷先生进而认定“是则就比较语言学上以推测匈奴民族之种属问题，与其认此民族为土耳其种之祖先，实不若认此民族为今蒙古种之远祖之为近真”^⑤。杨建新先生认为：

匈奴语言从它与阿尔泰语系中各语族的关系看，从它所处的时

① 郑师许：《匈奴先世鬼方猃狁与殷周之交涉》，载中山大学研究院辑：《文科研究所集刊》，1943（1）；孙次舟：《匈奴出现中国边塞的时代》，载《西北通讯》，1947（5）。

② 参见林幹：《匈奴墓葬简介》，载《匈奴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③ 江上波夫：《匈奴·芬同族论》，载《欧亚古代北方文化》（东京），1948。

④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3、4）。

⑤ 方壮猷：《匈奴语言考》，载《国学季刊》，第2卷，1930（2）。

代条件看,它是属于一种在阿尔泰语系三种语族规范化以前的一种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阿尔泰原语,即阿尔泰语系三种语族尚未分明时期的语言,它具有自己的特点,但又包含着其他相近语族的成分^①。

就相貌而言,陕西霍去病墓前有一“马踏匈奴”的石刻像,此像中匈奴的形貌面阔多须,唇厚鼻平,目小,其眼睑呈三角形。日本细川槲立氏藏有一胡俑,俑为银质,发结垂于帽后,衣左衽,缘领,小袖,束腰,长不过膝,其形貌额窄面圆,鼻平眉低唇厚,颐下多须。林幹先生认为,此俑“可能是匈奴人形象”^②。

就体质而言,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学者、匈牙利学者、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以及中国学者先后对可能属于匈奴人的骨骼进行了研究。在苏联,学者们主要对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塔拉斯河流域的肯特儿匈奴人墓葬、天山和阿莱地区的匈奴人墓葬、哈萨克斯坦的匈奴人墓葬进行了大量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我国学者韩康信先生在其《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一书中对上述研究的成果给予了介绍和评述^③。其曰:

总的来说,从中亚地区发现和收集的可能属于匈奴的人骨还不多,但就苏联学者发表的天山—阿莱和塔拉斯河流域的匈奴头骨资料,可能指出的几点是:

① 这些人骨如皆系匈奴者,则它们可能是匈奴的遗存。

② 从这些骨骼的形态测量学研究,它们都具有某些人种混杂的性质,特别是肯特儿材料上具有不特别强烈的蒙古人种性质和轻度的欧洲人种成分。而天山匈奴的材料与肯特儿材料有许多相近的特点,但比后者具有强烈的欧洲人种性质,因而金兹布尔格把它们归入有少量蒙古人种混合特征的中亚两河类型。

③ 关于匈奴的蒙古人种成分起源问题,还不是十分清楚的,一般设想他们起源于南西伯利亚和中央亚洲地区,而匈奴中的欧洲

①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31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② 林幹:《匈奴史论文集》,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③ 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395~402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人种因素则可能代表了当地居民原来的人类学类型。这种类型可以追溯到乌孙时期甚至更早的塞人时期。

④ 无论天山还是塔拉斯河流域的匈奴都有普遍改变颅型（近似圆锥形和枕部畸形）的风俗。这是贝加尔湖匈奴头骨不同的地方。

除此之外，在蒙古国的诺颜乌拉和呼尼河流域以及外贝加尔湖地区，匈牙利、蒙古的人类学家于20世纪60年代还曾经对一批属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匈奴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进行了骨骼形态等方面的测验。测验结果为：在诺颜乌拉和呼尼河流域的匈奴墓葬中，其人种可归入古西伯利亚类型；在外贝加尔湖的匈奴墓葬中，其人种存在少量欧洲人种混血，也可能有少量远东人种混血^①。

我国考古工作者和人类学工作者也就有关匈奴人种的问题进行过一些研究。研究工作主要是对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的桃红巴拉匈奴墓葬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附近的东汉匈奴古墓中出土的人类骨骼进行测量^②。桃红巴拉墓葬出土的人骨只有一具颅盖骨和面部皆残缺的头骨，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附近的东汉匈奴古墓由于出土的随葬品中发现一枚刻有“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的铜印^③，因而被认定是具有明确族属证据的匈奴墓葬，具有很高的参照性。据潘其风、韩康信先生的研究，桃红巴拉墓葬出土的头骨不很长，顶结节附近的似近颅宽很宽，估计为短颅类型。鼻指数在中鼻型上限，具有很高的面，眶高则低，属低眶型。鼻颧角所示上面部扁平度也大，鼻骨突度低。这样的综合特征比较接近北亚蒙古人种类型。青海大通匈奴墓葬的人骨是3具头骨（男1女2）。这三具头骨的共同特征是，具有较大的颅宽，颧宽小于颅宽，颅型扁短，同时有较大的上面高和很大的眶高（全呈眶高型），矢状方向面突

① [苏] Г. Ф. 捷别茨：《苏联古人类学》，载《苏联民族学研究所报告集》，卷四，1948（俄文）；T. 托思：《呼吉德（蒙古诺音乌拉）流域之古人类学的发现》，载《匈牙利考古学报》，卷十四，1962（英文）；[苏] N. N. 高赫曼：《依伏尔金斯克古城出土头骨的人类学特征》，载《布略特综合科学调查研究所报告集》，（俄文），1960（3）；[苏] N. N. 高赫曼：《俄罗斯地理学会特洛依茨—恰克图分布外贝加尔湖人类学研究》，载《俄罗斯民族、民俗和人类学史概论》，1977（7）（俄文）；[苏] H. H. 马莫诺娃：《外贝加尔湖匈奴人类学（樱花谷墓葬材料）》，载《民族史上种族系统学过程》，1974（俄文）。

② 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载《考古学报》，1976（1）。

③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上孙家的匈奴墓》，载《文物》，1979（4）。